

从高贵到流行

最先引发对糖的偏好的是英国王室——在王室的餐桌上，如果不能出现上流社会喜爱的精品，则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英王詹姆士一世在 17 世纪初期，废除了按身份等级来消费的规定后，“有能力过奢侈生活的人就是上等人”这种观念深入人心，进口奢侈品的需求便爆棚起来，茶、糖、烟草成为最受欢迎的舶来品。除了王室和贵族，只要是有钱人，都尽量用砂糖给自己装点门面。1650 年，牛津大学出现了一间天使咖啡馆，咖啡馆成了将砂糖与英国紧紧连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咖啡的饮用和茶一样需要放糖。所以糖逐渐从上层社会流入中产阶层的生活，再进入百姓之家，使英国成为一个“吃糖大国”。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在加勒比海和巴巴多斯使用黑奴种甘蔗，“护国主”克伦威尔把东印度公司改制为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公司。为了排挤在海上贸易重量级国家荷兰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他还制订了《航海法》并不断修订，作为英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一直用了二百多年。

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中，英国处在世界中心位置，这样的参照系下，中国和加勒比海放到地图的两端，欧洲和亚、非、拉连成了一条贸易纽带，而英国就是纽带的中心。牙买加自 17 世纪后半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砂糖产地，英国把生意做到欧洲以外之后，自己也成为殖民帝国，这场由贸易带来的变革被史家称为“商业革命”。英国就站在商业革命带来的世界构架的中心位置，并由此形成了“近代世界体系”。这场贸易进行了一百年的时候，英国从殖民地进口的砂糖量是法国的八倍至九倍——法国人饮葡萄酒，而不是加糖的茶。如此巨大的市场需要，使得英国砂糖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相应的需求还有保持英伦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银糖盒、银糖罐、银糖筛、银糖篮、银糖镊、银糖夹以及当时最高级的玻璃糖罐。1773 年英国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各种商品之中，砂糖就占了四分之一强。（川北稔《砂糖的世界史》）

英国人将对糖的热情以及对糖所代表的高贵的崇拜，带到了他们的殖民地和新大陆，只要英国国内流行什么，在殖民地和美利坚都

糖：被传染的甜蜜与苦涩

杨东晓

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加勒比海产出的蔗糖，成为英国自王室至贵族餐桌上最昂贵最时尚的用品。在此之前的年代，砂糖这种昂贵的东西只在药店里出售，并被认为能医治从眼科到胸科的许多疾病，还有说不清的淋巴病和体液病。在英国，只有王室、贵族才能在没病的时候享用砂糖。因此，蔗糖变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但随着世界贸易的开展，糖逐渐进入日常百姓之家，也正是由糖开始，揭开了一场长达三百年的重新构建世界商业秩序的序幕。

能找到，这也是使美国成为糖的消费大国的原因之一，那些种植园主都想把自己打扮成英国绅士。仿效英国绅士的生活方式，用英国流行款式的瓷器和银器盛放茶叶和蔗糖，成为有教养的标志，也是殖民地上流阶层的象征。

在殖民地上大发其财的英国人，把孩子送回英国上学，让其接触上流社会。这些种植园主出身的暴发户渐渐变成新贵，进而影响得国会议员围着他们转，一位种植园主还当上了伦敦市长。川北稔记录过这样一个传说：“有一些靠砂糖牟利、成为大富翁的种植园主过着堪与国王比肩的奢靡生活。乔治三世是个强势人物，他在 18 世纪下半叶缔造了一个强化王权的时代，然而当他在路上看见擦身而过的种植园富豪的马车时，带着饱受刺激的表情向同车的首相兴师问罪：“彼得，关税是怎么搞的！关税！”

美利坚为糖夺国

美洲种植甘蔗，是从 16 世纪初哥伦布航海时期开始的。大航海时代下，一些有关和无关的人都被牵扯到航海带来的机遇里。在远离欧洲大陆的美利坚，因为英国移民的关系，糖成为不可缺少的奢侈品。

但美国能种甘蔗的州并不多，发展到 19 世纪也只有七八个。造糖自给是远远不够用的，这就使美国成为糖的进口大户。工业化的到来，带给美国制糖业的机遇是进口粗糙的

红糖，再炼成精细白糖出口他国。《外国史略》中说对英国每年进口糖约三百二十四万石，纳饷一千四百八十四万两，其

质最粗，英人磋磨之，乃精且白。这一时期英美都是这样靠先进的机械化制糖，进口初级产品，出口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将自己由糖的消费国变成了出口国。在手工业和工业化、粗加工和深加工之间，赚取巨大的收益。

如何获得大量的糖，并把持糖的制造和销售，成了欧美政治家和商人共同的课题。身处地广人稀几面环海的北美大陆，美国自然比英国有更多的自然便利。

美洲大陆上的新移民，很快就发现了离旧金山三千八百公里以外的洋面上，有一个盛产甘蔗的群岛，吃苦耐劳的中国移民正在这里用他们古老的石臼和铁锅造粗糖。当然，这些中国最早的夏威夷移民也没有想到，他们在距离关山数千公里之外的太平洋小岛夏威夷上的生产和生活，不仅带给美国充足的糖源和贸易收入，还导致了夏威夷王国的灭亡。

1802 年，中国人最初登上夏威夷时，这里长着茂盛的甘蔗，但是岛的人并不懂得榨汁制糖。中国开拓者用家乡带来的最原始的石臼糖碾和熬糖锅，在夏威夷群岛的兰尼岛上炼起了有点泛黄的粗糖。这里丰富的甘蔗资源引来了更多的华人

和白人。而白人一来就是开设大规模的机械化糖厂，并很快淘汰了华人的手工作坊。夏威夷制糖业的第一次机遇是 1861—1865 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战争使糖价长了五倍，欧美人立刻逐利而来。1876 年，夏美两国签订了蔗糖免税进入美国的条约，这无疑给岛上的制糖业打了一针兴奋剂。中国人陈芳开始收购岛上的糖厂、蔗田、先进设备，并从

45. 小书摊的常客

那根搓成细长条的年糕被我啃到笔套一般长短时，小皮匠回来了，把一个油纸包摔到我面前。我吓了一跳，以为这是什么新式刑具，上刑罚要开始了。小皮匠走上来，一把夺过我手上那段乌漆墨黑的年糕，丢在地上，说：“吃了它。”他指的是那个油纸包。我这时已经闻到油纸包里传出来的香味了，打开一看，是包猪肉。我不敢相信地看看小皮匠，小皮匠点点头。我抓了一块放进嘴里，油濡濡，韧嘎嘎，太香了。我又抓了一块，同时把油纸包朝小皮匠面前移了移。小皮匠说：“吃吃光，吃了精神足，好给我继续闯祸去，继续拆家当。有你这个讨债鬼，我一生一世也寻不到老婆了。”

那天夜里，小皮匠一直在床上翻来覆去。我也几乎一夜没睡好，肚皮痛，一歇歇就起来蹲痰孟罐。这段时间，我基本上每天就靠一根年糕过日子，一点油水也没有，肚肠已经干得萎缩了，一下子一斤猪肉下去，油水太足了，滑肠了。天快亮的时候，我又一次起来蹲痰孟罐，发现小皮匠终于睡着了，睡得十分痛苦，面面相觑，还磨牙齿，叽叽咯咯，感觉是一窝老鼠在开小组会。

以后的几天，小皮匠像生了一场病，胡子也懒得刮了，人明显瘦了不少，酒量倒比以前好了。有人讲，陈翠英也不见了，酱菜店换了一个矮胖女人。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上次和唐唐为孙悟空的妈妈辩论了一回，我就迷上了小书摊。小皮匠酒量大了，我就更加有空子可以钻了。这几乎就是小皮匠的灾难，因为他从此以后很难再喝到不掺水的酒了。

我是小书摊的常客了。四个书架上，一层一层排满了小书。小书就是连环画。每个书架之间用铰链连在一起，像屏风一样展开着，书架下面装着滑轮，收摊时只要折起就能推着走。我再也沒有见过比摆小书摊的老头眼珠子更灵活的人了，他就坐在一把高脚竹椅子上，居高临下，头并不怎么转动，只是两只眼珠子就像探照灯一样，不停地左右扫描，谁要想偷走一本或者撕下一页是不可能的。

小书摊为我打开了一个神奇美妙的世界。你要是过过一段苦日子，每天只有一根硬

中国招募了上千华工，建起当时最大的糖厂，为他日后成为华侨中的第一位百万富翁打下基础。从这一年开始，夏威夷政府开始向亚洲国家大量招募劳工。

1891 年，利留卡拉尼继承了兄长卡瓦卡努的王位，成为夏威夷的末代女王。利留卡拉尼见多识广，她年轻时游历欧洲，思考并研读过欧洲各国的宪法，她曾想在自己的岛国颁布一部夏威夷大法以抗衡美国，但是来自欧洲和美利坚的白人商团不同意。在他们看来，新王法有可能影响他们在全球的食糖贸易，断了他们的财路。

1893 年的 1 月，由一百多名美国人，那些商团的会员手执火枪与前来支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里应外合，占领了女王的王宫，推翻了这个家族对夏威夷九十三年的统治，女王曾带着夏威夷土著联合签名的文件到美国国会去请愿，但等待她的却是被软禁在岛上。美国人又经过了五年的“努力”，终于将夏威夷这个出产蜜糖的花园，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地区。

较之末代女王利留卡拉尼，同在夏威夷生活的这位中国香山海晏人氏还算幸运得多。陈芳比女王还大十三岁，1849 年二十四岁的陈芳到夏威夷当学徒时，未来的女王还是一位头戴花环的少女。后来，陈芳和女王有了点姻亲关系，这位食糖实业家兼巨贾曾出资把他夏威夷妻子的义兄卡瓦卡努推到了夏威夷第七位国王的位置上。自己也因之成为枢密院议员。光绪皇帝在 1881 年又钦命他为中国驻檀香山总领事。卡瓦卡努国王到中国访问就是陈芳赞助的，他还安排国王会见了李鸿章。

由于陈芳身为中国驻夏威夷领事馆总领事的缘故，夏威夷华人从此可以享受领事保护权。夏威夷王国还通过了多项保障华人权益的法案。陈芳并没在白人商团的政变中受到太大的损失，因为他在利留卡拉尼登基前一年，就变卖家产，并将其中的三分之一——六十万美元的家产带回了中国，开始了造福乡梓的又一个阶段的生活。（摘自《人文春秋》九州出版社 2016 年 7 月版）

邦邦的年糕相伴，突然往你面前放上一大盆猪肉，你会是什么心情？这就是我来到小书摊时的心情。我就像一个永远也吃不饱的人——事实上我也很少真正吃饱过——时时刻刻惦记着饭菜一样，有一空就朝小书摊跑。摆小书摊的老头见了我就像见到老朋友一般点点头，然后伸出手来。你要是以为他是要和我握手那就错了，我们之间不讲究这个客套，他是从我手里接钱呢。看一本小书一分钱。看一本新出来的小书两分钱。

有一回，有个比我大的男孩，趁老头点香烟的工夫，飞快地把一本小书塞进裤腰。点香烟的时候，探照灯会停止工作，看来那个男孩也是小书摊的常客，已经摸到了这个规律。老头舒舒服服地吐出了一口烟，继续精光贼亮地扫描起来，一点没察觉刚才错过了什么。男孩依旧大模大样地看着小书，老头烟瘾很大，我猜想那男孩是在等待第二次作案机会。其实我不想出卖他的，不过我要是不告发，老头发现缺了小书，难免连我也一起怀疑。我看到探照灯扫过来了，便眨眨眼发出信号，同时用嘴巴朝旁边努了努。老头明白了，走到那男孩身边，一把撩起他的衣服，那本小书便露出来了。那男孩吓得浑身发抖，不断讨饶：“老公公，放我一马，不要告诉我阿爸，不要告诉学校，我保证再也不偷了。”老头让他把裤带解开，手伸进去角落落摸了一遍，没发现什么，恶狠狠地说：“下次再偷，我就割了你的小麻蛋。开水一烫，过老酒。”那男孩拎了裤子就逃。

老头转过身来拍拍我的头：“以后放学就过来看小书，我不收你钞票，老头子算是和你交朋友了。”老头露出满口烟熏火燎的牙齿笑了。我怀疑老头不开心，马上警觉地看了看他的鞋子，他的圆口布鞋已经有半个小脚趾露在外面了。老头看穿了我的心思，笑着说：“你放心，我不会和你小孩子做生意的，我让你阿爸修鞋子，照样付钞票，一分不少的。我是看你看书用功，不过，小阿弟，以后不要再做朝酒里掺水的蠢事体了。要是让你阿爸晓得，把你这两片耳朵撕裂了，也是蛮可惜的。”老头喜欢笑，说完了又哈哈大笑。

傅海澜传

董煜



27. 对学生运动的同情与支持

有位燕大政治系的学生（共产党员）事后回忆：“由于燕大是美国教会创办的，政府不敢妄加干涉，军警也不敢进校骚扰，因此，共产党在校园里几乎能公开活动，从而使反日爱国运动蓬勃地发展。学校当局对这些活动从来不予阻挠，因此，燕大从未发生过像其他大学那样，因校方干涉学生运动而举行罢课。反之，校方特别是司徒雷登校长，还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在学校和司徒雷登的‘保护伞’下，学校党支部的活动很少遭到破坏，党员也发展到五十多人，这可能是北京各大学党员最多的学校。”“一二·九”运动当天，燕大 70% 的学生参加了游行，当天晚上，在燕大新闻系任教的美国记者斯诺即详细报道了中国学生的这次抗日救国运动。

“一二·九”运动持续了两个月，运动后期，许多进步学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司徒雷登指定了几名校方工作人员，协助那些学生制定各种不同的逃跑线路，而他则安排朋友在沿途守候，为需要的学生提供经济援助，甚至还为女学生设计了经由香港、仰光，再沿滇缅公路前行的路线，虽然颇费周折，但比较安全。这段时间里，大约有超过百名以上的燕大学生和校友奔赴延安，至于去大后方的那就更多了。

1936 年，燕大新闻系教授斯诺前去陕西采访前，曾与司徒雷登长谈，虽然谈话内容不详，但根据日后司徒雷登的言行判断，司徒当时是极力主张斯诺此行的，甚至还有人亲眼见到司徒家中藏有共产党的书籍和文件，有人问过，司徒雷登说是学生存放在他那里的。

英籍教授林迈可 1937 年受邀来燕大任教，司徒雷登请他在临湖轩居住，与自己比邻而居。司徒雷登的一言一行林迈可都看在眼里，对司徒雷登非常钦佩和信任，因此从不隐瞒自己支持中国抗战的观点和行动。1938 年夏，林迈可在司徒雷登的掩护下来到吕正操将军的司令部，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欢迎和接待。随后，他被护送越过平汉铁路，进

入设在山西省五台山区的聂荣臻将军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的八路军总部，林迈可还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并利用自己的技术为总部通讯科检修了电台的通讯设备。

回到北京后，林迈可深感边区抗战物资的匮乏，决定利用自己外国人的特权，为根据地做点事。他根据八路军的需要帮助购买日本人严格控制的医药物品和无线电台零件。为了准确记录所买药品的详细名称和功能，他找了一个老实可靠的女学生李效黎帮他整理药签，后来李效黎成了林迈可的妻子。有一天晚上，海澜又跟着父母亲去探望司徒雷登，林迈可夫妇也在一起吃的饭，后来得知，那天饭后，司徒雷登又让林迈可乘坐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的小汽车出城，去了根据地。

“七七事变”后，燕大处境艰难，经常受日本宪兵骚扰。一天，20 多名日本宪兵来燕大校门前，扬言要抓一名共产党学生，司徒雷登得到报告，拒绝日本宪兵的要求。他说，燕大是美国人开办的学校，受治外法权保护，任何外国人要进校园搜捕学生必须先得到美国批准。但日本宪兵还是执意要进来抓人，这次司徒雷登不再与他们周旋，说他将立即向美国领事馆抗议，要求美国政府向日方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宪兵怕把事情闹大，只好悻悻而去空手而归。在碰了那次钉子之后，日本人领略了司徒雷登寸步不让的个性，一时倒也不敢再到燕大来找麻烦。

对司徒雷登为什么要保护和帮助那些亲共的师生，很多人不理解，曾有人想从傅泾波那里得到答案，而傅泾波的回答是：因为他们是他的学生，而他是校长；因为他们在困难之中，而他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因为他们是抗日救国，而他本人是半个中国人。由此看来，傅泾波确实是懂司徒雷登的。

司徒雷登对学生运动的同情与支持，赢得了广大爱国学生的尊敬，有学生撰文称，“现在全北平各大学的同学普遍努力于救亡工作，其他各校均受到校方无理摧残，司徒雷登先生虽不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他对中国的厚爱并不亚于我们，对于我们从没有一点压迫和干涉”。文章还赞扬了司徒雷登自由、平等、博爱、和平的思想，号召进一步开展爱国救亡运动作为对司徒雷登的报答。